

# 一九一一年蒙古獨立運動原因之探討\*

藍美華\*\*

## 摘要

1911年年底，外蒙脫離中國，宣佈成立「大蒙古國」。這個新建的國家在各方蒙人努力下，維持了三年多的壽命，直到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簽訂協約後才被迫撤銷獨立，成為中華民國轄下的自治地區，此次蒙古獨立運動也宣告失敗。

外蒙為何在加入滿清帝國兩百二十年後決定尋求獨立、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此一獨立運動的原因相當複雜，筆者將其分成三類：遠因、近因與最終因。遠因包括經濟的破敗與滿清官員的無能，近因包括清末對蒙政策的改變以及三多、唐在禮等人的施政，而最終因則是清朝的崩解。筆者在論文中還討論了俄國在此運動中的角色，並提出抗爭的前例，證明此一獨立運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不滿情緒累積的結果。在這些原因當中，整體經濟的破敗、滿清對蒙政策的改變以及清朝潰亡等涉及大環境改變的因素自是獨立的主要因素，而俄國的角色及個人的負面經驗則屬次要因素。

關鍵詞：蒙古、獨立運動、滿清對蒙政策、新政、俄蒙關係

收件：2002年11月；修正：2002年12月；接受：2002年12月。

\* 本文原稿曾發表於中國民族學會與蒙古科學院國際研究所共同主辦之「1910-1919年北京與庫倫政治關係學術研討會」，2000年12月16日，烏蘭巴托。

\*\* 本文作者藍美華為哈佛大學內陸亞細亞與阿爾泰研究（Inner Asian and Altaic Studies）博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

## 壹、前言

在滿人的帝國打造過程中，內蒙各部率先於 1636 年加入，幫助滿人征服中原，建立一個長達兩百餘年的龐大帝國。外蒙的喀爾喀人在 1691 年加入此聯盟以逃避厄魯特準格爾部的壓迫。而厄魯特各部領導王公間權力鬥爭所引起的紛擾，迫使清廷介入，在阿穆爾撒納失敗並於 1757 年死亡後，厄魯特也成為滿清帝國的一部份。蒙古各部間的分裂與衝突讓統一的滿人有機會成為其統治者。不同的蒙部加入滿清帝國的時間不同，加入的原因條件也相異，因此和滿人關係的親疏程度也不一樣。蒙古各部大多是在鬥爭進行中判斷對本身具有戰略利益的情況下歸順滿人的。

滿清對蒙政策的戰略目標是利用蒙人作為可動員的軍事儲備力量為其防衛帝國北疆，並讓蒙人無法統一在一個強大的領袖之下。為了控制蒙人，滿人利用盟旗制度限制蒙旗間的移動，建立各級行政管理機構，藉由世襲爵位、名號、薪俸、賞賜和聯姻等辦法維持蒙古貴族對清朝皇帝的忠誠，以一套控制和懲罰的制度監視蒙古王公。此外，清廷長期採取蒙漢隔離政策，試圖避免蒙人受到漢人影響和剝削，防範蒙漢民族聯盟的可能，並且限制漢人移民在不會激起蒙人反彈的程度之下。在宗教政策方面，滿人一方面尊重蒙人的佛教信仰，一方面卻以提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和章嘉活佛的方式削弱達賴喇嘛在蒙古的影響力；稍後並限制哲佛只能在西藏轉世以避免外蒙政教勢力結合的危險。

滿清早期對蒙政策是成功的，蒙古地區也相對地平靜。然而，在滿清王朝轉變為一個漢式政權並且捲入與海事強權的國際糾結之後，蒙古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日益降低，滿人將更多心力放在中國內地事務上，滿蒙關係也隨之疏離。此外，由於中國人口急劇增加造成內地土地資源嚴重不足，愈來愈多人民被迫前往滿洲或蒙古地區覓食。日本和俄國在滿蒙地區日益增強的野心促使清廷必須加強鞏固對該地區的控制以抵擋新增的壓力。以上種種原因導致滿清對蒙政策的改變。清廷正式取消漢人移民蒙地的限制，積極在蒙古推行新政，引發受到威脅的內蒙人的積極反抗，而原先享有比內蒙更多自治權力的外蒙喀爾喀人對激進的新殖民政策反應更為強烈，迅速在 1911 年決定尋求獨立。<sup>1</sup>

<sup>1</sup> 關於早期滿蒙關係、清朝對蒙政策以及新政之緣起，參見 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Manchu-Mongol Relationship in the Late Qing,"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8, No. 2, June 2007, pp. 151-176.

1911年7月，當滿清政權正處於風雨飄搖之際，外蒙的王公喇嘛利用一年一度向外蒙宗教領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獻禮致賀的宗教節慶，召開會議，討論外蒙何去何從的問題。他們決議要脫離中國，回復獨立，並決定派遣一個代表團，祕密前往俄國，尋求援助。是年年底，外蒙王公喇嘛在庫倫（今烏蘭巴托）正式宣佈成立「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公推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大汗，年號「共戴」（Olana Ergüdegsgen）。「大蒙古國」的國號充分顯示庫倫政府的期望，即此新國家的領土將不僅止於原由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統轄的外蒙地區，也企圖將其他蒙人居住活動區域－尤其是內蒙與呼倫貝爾－納入其版圖範圍，之後庫倫政府的種種做為也證明了此一目的。<sup>2</sup>

儘管蒙古獨立運動獲得各地區蒙古人的支持，但它仍舊失敗了。除了曾於1913年與西藏簽訂承認彼此獨立的條約外，「大蒙古國」未能獲得其他國家的外交承認。<sup>3</sup> 外蒙的地位在1913年11月的中俄聲明文件中被降為自治，並在1915年6月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圖簽訂的協約中確認，外蒙成為中華民國轄下的自治地區，<sup>4</sup> 而此次蒙古獨立運動也正式宣告失敗。

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pp. 8-39, 60-77。

<sup>2</sup> 1911年的蒙古獨立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泛蒙古運動的雄心。1912年大蒙古國的軍隊順利將清朝派駐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的官兵逐出外蒙更加強庫倫領導者的自信。庫倫政府隨時隨地鼓吹泛蒙古的思想，訪問俄國首都以及參與恰克圖三方會議的蒙古代表團中均有內蒙代表在內。庫倫和內蒙及呼倫貝爾維持密切聯繫，並授與此二地區投效大蒙古國的王公爵位、名號、甚至官職。1913年庫倫政府派兵意圖解放內蒙的軍事行動更充分顯示其建立一個泛蒙國家之企圖。儘管蒙古獨立運動主要是由外蒙領袖發起，但建立一個泛蒙國家絕非喀爾喀人的理想而已，其他地區的蒙人也認同此一想法，因此，1911年的蒙古獨立運動象徵不同地區蒙人的共同努力。關於此次獨立運動的泛蒙古意涵，參見 Mei-hua Lan,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p. 152-193, 253-255。

<sup>3</sup> 蒙藏條約內容，參見 BNMAU-yn ShUA-jin Tüükhiin Khüreelen NAKhYa-ny Dergedekh Ulsyn Arkhivyń Kherég Erkhlekh Gazar, *Mongolyn ard tünnii 1911 ony ündesnii erkh chöлlöö, tusgaar togtnolyn töлlöö temtsel,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1900-1914)* (以下簡稱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Gazar, 1982), 189-190；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台北：廣文書局，1976年版、1922年初版），第一篇，頁39-40。

<sup>4</sup> 關於中俄聲明文件及照會，參見外交部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03-32（機關號），168（函），173（宗）(1)(冊)，民國2年11月5日；Ministerstvo Inostrannyykh Del, *Sbornik diplomaticeskikh dokumentov po Mongol'skomu voprosu (23 avgusta 1912 g. - 2 noiabria 1913 g.)* (Sankt-Peterburg, 1914), no. 105, s. 87-90；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1），頁186-189；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二篇，頁16-18。關於中俄蒙協約，中文本參見陳篤，《止室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71年版、1917年初版），頁42-5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1045（機關號）-308（案卷號），

二十世紀的外蒙在政治上經歷三次重大變革，外蒙學者稱之為三次革命，首先是 1911 年的獨立運動，其次為 1921 年的獨立運動，再其次則為 1990 年的民主改革運動。<sup>5</sup> 1911 年獨立運動失敗後，外蒙並未放棄其建國理念，1921 年在俄國支持資助下再次獨立，並於 1924 年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死後改國號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為全世界第二個共產國家，直到 1990 年年中才正式放棄共產主義及一黨專政，向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轉進。<sup>6</sup>

因為 1911 年的獨立運動是由王公喇嘛領導進行、建立一個以宗教領袖為大汗的帝制國家，在高舉無神論的共產時期，外蒙史家將其視為封建時期的最後階段，在書寫其現代史時均跳過不談，而從 1921 年的革命寫起。但在民主改革後，外蒙史家重新詮釋歷史，對 1911 至 1921 年間的歷史產生濃厚興趣，不但將外蒙現代史推前十年，對 1911 年獨立運動的歷史地位與意義也有相當正面的評價。在此氛圍下，探討此獨立運動的原因自然有其意義。

外蒙為何在加入滿清帝國兩百二十年後決定尋求獨立、建立屬於自己的國家？參加此運動的蒙古人，是為了個人利益亦或公眾福祉？是為了政治的解放亦或社會經濟地位的改善？是為了重建歷史的光榮亦或追求未來的幸福？1911 年蒙古獨立運動的原因相當複雜，本論文即將就各種遠近因素加以探討，以期對此運動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

民國 4 年 10 月 6 日；法文本及蒙文本，參見 Mongol Ulsyn Ündesnii Arkhivyn Gazar, Shinjlekh Ukhaany Akademiin Tüükhiiin Khüreeleen, Khiatad, Oros, Mongol gurvan ulsyn 1915 ony Khiaglyn geree (*Ödör tutmyn temdeglegel*):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Ulaanbaatar: Sogoo Nuur, 1999), 518-545；該書亦收有俄文本內容及中蒙文本的俄文翻譯（503-515）；蒙文本亦可參見蒙古國中央歷史檔案館（烏蘭巴托），FA-1，Kh/N-37，引自 L. Jamsran, niitlüülsen, Mongolyn tüükhiiin deej bichig, 4 devter, (Ulaanbaatar: Surakh Bichig, Khüükhdii Nomyn Khevleeliin Gazar, 1992), 43-47；英文譯本，參見 John V. A. Mac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Vol.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pp. 1239-1243。

<sup>5</sup> 外蒙學者厄爾德尼圖雅（N. Erdenetuya）之書即以《蒙古的三次革命》（*Mongolyn gurvan khuv'sgal*）為名於 2000 年在烏蘭巴托出版，該書內容即在探討外蒙此三次大變革。

<sup>6</sup> 1989 年年底外蒙出現推動民主改革的新生力量，蒙共開始進行內部改革，並公開放棄一黨專政的特權。1990 年 2、3 月陸續出現反對蒙共的黨派，5 月中旬政府宣佈任何黨派皆可登記為正式政黨，7 月下旬進行首度自由選舉，外蒙步入多黨政治的新紀元。參見廖淑馨，〈一年來外蒙古的政治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 34 卷第 5 期，1991 年（5 月），頁 33-45。

## 貳、經濟的破敗

蒙古地區在滿清統治下重大的改變之一是漢商的滲透。在歸順滿人之前，蒙古並無漢商存在。蒙人通常是趕著他們多餘的牲口、帶著獵來的毛皮到邊市，或利用朝貢機會在北京出售。然而，當清朝皇帝成了蒙人的大汗後，後者不再需要南下出售牲口毛皮，而是由漢商北上蒙古草原加以收購。1637年，亦即滿人取得內蒙不久後，皇太極就命令數位滿人貴族帶著一百多位商人和貨物到呼和浩特做生意。<sup>7</sup> 滿人征服中國內地後，蒙漢間的貿易更加方便。根據外蒙學者三吉道爾濟（M. Sanjdorj）的研究，檔案資料和外蒙當時的歷史事件可以確定中國商人和放高利貸者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已經滲入外蒙。<sup>8</sup>

清廷制定了一套辦法來管理蒙漢間的貿易。起初貿易只能在固定的幾個地點進行，後來漢商才得以進入蒙古做生意。從規定視之，除了禁娶蒙婦外，清廷對漢商在內蒙的貿易行為並無特別限制。<sup>9</sup> 然而，那些在烏里雅蘇台、庫倫、恰克圖和外蒙喀爾喀人中做買賣者必須根據他們入蒙路線向察哈爾都統、多倫諾爾同知或綏遠將軍申請理藩院發下的許可書。<sup>10</sup> 取得許可的漢商必須遵守相關規定，而蒙地官員和札薩克必須對這些商人的活動加以監督。這些規定包括：商隊人數不得超過許可人數，須依申請路線行進，只在規定地點進行貿易；除了生鐵鑄造的鍋子和小物件外，不得賣給蒙人任何鐵器，以免後者用以製造武器；每件許可書有效期限為一年，必須在限期內返回；在蒙旗內進行買賣時，只能住用帳篷，不可建造房舍；禁娶蒙婦，禁用蒙名，亦不得貸與蒙人大筆銀兩。商人若違反規定，其貿易許可將被取消或遭受其他處罰。<sup>11</sup>

<sup>7</sup> 覺羅勒德洪等，《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1964），卷36，頁10a。

<sup>8</sup> M. Sanj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Urgunge Onon, tran. (London: C. Hurst and Company, 1980), p. 23. 有關中國商人和放高利貸者何時進入外蒙的詳細討論，參見本書第二章。

<sup>9</sup> 矢野仁一，《近代蒙古史研究》（東京：弘文堂，1925），頁261。

<sup>10</sup> 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影印，1976年版、1899年初版），卷67，頁5a。

<sup>11</sup> 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卷67，頁5b；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台北：啓文出版社影印，1963年版、1886年初版），卷978戶丁、983邊務；陳炳光，《清代邊政通考》（台北：南天書局，1987年版、1934年初版），頁189、226-229；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

儘管清廷設立種種規定，但因滿清官員、蒙古王公與上層喇嘛紛紛成為投資者或股東，與漢商成了利益共同體，未能對後者的活動嚴格監督，因此在外蒙的漢商人數、貨品數量種類以及業務項目日漸增加，漢商也逐步控制了當地的經濟。被稱為「東口」的張家口由於地點便利，漢商多在此設立其對蒙貿易基地。從清朝時期此地對蒙商號數量的增加即可看出對蒙貿易的擴張。康熙初年，張家口只有大約 10 家商號，但到 1912-1920 年時已增至 718 家。<sup>12</sup>

在 1860 年代，外蒙有數十家漢商，到二十世紀初期，大小商鋪及分店已增至 500 家左右，其中在庫倫一地就有 160 家。而由於高利貸的擴張，在二十世紀初，外蒙除了蒙旗所欠的公共債務外，平均每戶私人債務高達 500-1000 銀兩。1911 年，每旗的平均債務高達 1100 萬兩。<sup>13</sup> 在 1912 年之前，每年外蒙最大漢人商號大盛魁即可從該地區獲得 50 萬隻羊和 7 萬匹馬作為利息。而在外蒙 104 個蒙旗與沙比納爾<sup>14</sup>中，僅有 10-12 個未積欠大盛魁任何債務。<sup>15</sup> 因此，外蒙學者總認為漢商從事的買賣與高利貸活動不只破壞了蒙人的生計經濟，而且影響了外蒙生產力的發展。<sup>16</sup> 在漢商大力推動下，蒙人使用的漢地貨物日漸增加，蒙人以往自給自足的經濟型態遭到破壞，漢商利用高利貸手段控制了蒙古的經濟，各蒙旗成了負債累累的債務人。

除了遭受中國內地商人和蒙古王公經濟上的剝削外，蒙古牧民還要負擔滿清政府規定的各項重稅及勞役，而清朝當局交由外蒙喀爾喀人負擔的最大任務是卡倫和台站的維護。從 1727 年至 1765 年，清廷沿著中俄邊界一連設立了 82 個卡倫，其目的在防範俄人與蒙人的交通往來，而其中的 70 個是由蒙人負責維護的。1760 年，有大約 900 名士兵駐守這些卡倫，而在 1777 年則由 1230 名士兵和其家人駐守。蒙人必須供應卡倫各項食物、馬匹和其他必需品。在台站方面，蒙民除了提供自身所屬蒙部所需驛役外，在十八世紀，他們還要維護大約 120 個台站，由 1326 戶蒙民負責。多數的台站是由從內蒙移居的喀喇沁人負責，但其

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旅蒙商大盛魁》（內蒙古文史資料，第 12 冊）（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1984），頁 2；A. P. Okladnikov & Sh. Bira, red., *Istoriia mongol'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Izd. 3-e, 1983), s. 226。

<sup>12</sup> 後藤十三雄，《蒙古の遊牧社會》（東京：生活社，1942），頁 236-237。

<sup>13</sup> *Istoriia mongol'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s. 231-232.

<sup>14</sup> Shabinar, shabi 意為寺院屬民，nar 為複數。

<sup>15</sup> I. M. Maiskii, *Mongoliia nakanune revoliutsii*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 1959), s. 172.

餘部分是由喀爾喀人負責。十八世紀期間，這些喀喇沁人漸漸無法從家鄉得到人員增援和物資補給，因此必須由當地喀爾喀人來負擔所需。此外，從 1730 年代開始，清廷在外蒙的行政機構在人員編制與工作複雜性方面均有增加，支持這些機構所需之稅金負擔對一般蒙民而言也是日益繁重。而每年派遣人員進京朝貢所需的費用又是蒙人另一沉重負擔。<sup>17</sup>

清廷對蒙人的各項稅收逐漸加重。若單以 1855 年喀爾喀四部（ayimagh）貢獻於滿清軍需、提供三十萬兩和相當數量的軍隊來計算的話，平均每戶蒙古人家就得分攤八十兩。十九世紀下半葉，很多蒙人被清廷動員前往對抗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等內外敵人。清廷也一再要求蒙人提供其在外蒙駐軍所需的坐騎與糧食。例如，1860 年在外蒙西部邊界的滿漢駐軍約 62500 名，該年三音諾顏汗與札薩克圖汗兩部就得供應此駐軍 3400 匹馬、1700 隻駱駝、以及從巴圖哈拉嘎（Batukha’algha）至烏里雅蘇台沿途 34 個台站所需之 340 名嚮導。<sup>18</sup> 1860 與 1870 年代陝甘與新疆回變時，外蒙牧民也受到很大影響。除了財產遭掠奪外，為了配合清廷平定回亂，他們所需繳納的稅金和提供的勞役均有增加。清廷駐外蒙將軍大臣命令喀爾喀四部供應八百頂帳篷、四千隻駱駝、八千匹馬、六千頭黃牛和十萬隻羊。蒙民生活更加悲慘，他們對滿清剝削之不滿情緒也日益加深。<sup>19</sup>

清末，不僅一般蒙民因遭受滿漢官民及自己王公的壓迫而普遍貧窮，連蒙古王公本身也積欠施放高利貸的漢商大筆債務。有些學者相信，蒙人渴望脫離中國獨立是因為他們寄望以此一筆勾消積欠漢商的債務。<sup>20</sup> 此推論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對欠下大筆債務、償還遙遙無期的蒙人而言，為了宣洩內心的不滿、逃脫悲慘的命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旦時機來臨，獨立就成了最容易的選擇。

<sup>16</sup> Sanjdorj,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p. xiii.

<sup>17</sup> C. R. Bawden,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9), pp. 101-104, 109.

<sup>18</sup> B. Shirendev & Sh. Natsagdorj, red., *Bügd nairamdash Mongol ard ulsyn tüük*h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n Khereg Erkhlekhan Khoroo, 1968), 2: 288-289.

<sup>19</sup> A. Pozdneev, *Mongoliia i Mongoly: rezul'taty poezdki v Mongoliu, ispolnennoi v 1892-1893 gg* (Sankt-Peterburg: Tipografiia Imperatorskoi Academii Nauk, 1896-1898), 1: 595, 614; A. Ma. 波茲德涅夫，《蒙古及蒙古人》（第 1 冊）（呼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1989），頁 640, 660-661; *Bügd nairamdash Mongol ard ulsyn tüük*h, 2: 301.

<sup>20</sup> A. Rish, "Mongoliia na strazhe svoei nezavisimosti," *Tikhii okean*, no. 4 (6) (Oct.-Dec., 1935), p. 99, cited from Peter S. H. Tang, *Russia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99.

## 參、滿清官員的無能

滿人入關之前，努爾哈赤與皇太極積極爭取蒙人的友誼與協助以打敗敵對勢力、征服中國。清朝建國之初，由於政權尚未鞏固，外蒙與西蒙仍非清廷所能控制，滿人有求於內蒙蒙人之處仍多，因此優遇蒙人，雖在蒙地設置盟旗，但彼此關係仍如盟友一般。然而，迨外蒙王公來歸，滿清政權已趨穩固，加以平靖西蒙準格爾反抗勢力之後，清朝政府逐漸從一個滿式政權轉為漢式政權，蒙人的利用價值降低，清廷對蒙人的態度政策也有所轉變，彼此關係從原本較為平等的合作關係轉為上下君臣的支配隸屬關係，清廷對蒙人的控制加強，而優遇減弱。在此種情況下，蒙古王公的權力和影響力逐漸下降，幾乎無法參與上層決策過程，而滿清駐蒙官員的力量則持續坐大。<sup>21</sup> 因此，滿清駐蒙官員素質的良莠對蒙民生計福祉具有更大影響力。

可惜的是，清末官員的腐敗卻一直為蒙人所詬病，也是造成外蒙反滿情緒增長的另一原因。當清廷開始鬻賣官職以紓解財政困難，<sup>22</sup> 其派駐外蒙各職均可以高價賣出，尤其是庫倫辦事大臣一職，滿洲官員沒有二十萬兩是無法獲得的。相對地，擔任這些職務者亦可望在其任職期間獲得金錢上更大的回收，庫倫辦事大臣進款豐厚，年入五十萬兩以上。<sup>23</sup> 清廷收到許多批評駐外蒙官員施政不良的奏章，也有官員因此遭撤職。例如，因為貪污之故，常順和托克湍分別在 1874 及 1891 年遭解除烏里雅蘇台將軍之職，桂祥在 1885 年遭解除庫倫辦事大臣之職，而瑞洵在 1905 年遭解除科布多參贊大臣之職。<sup>24</sup> 滿清官員的貪污行為常因其同僚檢舉而曝光，其中有些是因分贓不均、彼此爭執而產生。

<sup>21</sup> 李毓澍，〈庫倫辦事大臣建制考〉，收於氏著《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頁 121, 178。

<sup>22</sup> 據說戶部每年藉著賣官可以有三百萬兩的收入，參見劉坤一、張之洞，《江楚會奏變法三摺》（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版、1901 年初版），頁 56。

<sup>23</sup> 陳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一篇，頁 1。

<sup>24</sup> 覺羅勒德洪等，《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1964），卷 365，頁 2a-3b, 19。覺羅勒德洪等，《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以下簡稱《光緒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1964），卷 217，頁 9a-10a；卷 220，頁 7a；卷 298，頁 7b-8a；卷 550，頁 14b。關於瑞洵之貪污，亦可參見吳豐培編《連魁科布多奏稿》，《科布多史料輯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 3a-11a。

蒙人對滿清官員的印象在 1911 年外蒙代表團呈給俄國政府的信中清楚地顯示出來。在該信中，滿清官員遭指責的不當行為包括（一）在爵位的合法繼承和高階官職的任命方面，從候選人手中取得大筆銀兩後才將其名單上呈朝廷認可；（二）居中取走清朝皇帝賞賜給蒙古王公的禮物；（三）處理蒙漢爭端時不公正地偏袒漢人；（四）當無辜蒙民因逃避滿清官員的壓迫而離開自屬蒙旗時，官員不但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以共犯為由向蒙民藏身之蒙旗罰款數萬銀兩。<sup>25</sup> 貪污不公似乎成了滿清官員的印記。

實際上，駐外蒙的滿清官員也並非總是蒙蔽上級或對地方情況視而不見，他們有時也會向朝廷誠實反映民情。1903 年，當有官員建議將蒙古部落改設行省時，烏里雅蘇台將軍與科布多參贊大臣雙雙回覆，表明該建議有害無利並不可行。庫倫辦事大臣也認為外蒙與內地邊疆情況不同，一例辦理多有窒礙難行之處。他表示，東三省沃土甚多，早在朝廷派官治理之前，市鎮鄉村已然星羅棋布，設治管理乃自然之事；而在外蒙漢人多非永久居民，若將蒙地放墾並改為行省，只會驚嚇蒙人、製造事端而已。<sup>26</sup> 儘管滿清官員並非完全一無可取，但其在蒙人心目中的印象卻多為負面，也影響了蒙人對滿清政權的看法。

## 肆、清末對蒙政策的改變

除了清朝初年與少數特殊情況<sup>27</sup>外，清朝政府訂下規矩，嚴禁漢人移民蒙古。儘管漢人移民持續增加，蒙地開墾也不斷發展，但清朝官方的禁制政策直至 1902 年才有所改變。清廷政策的改變和其本身畏懼日俄積極在滿蒙地區擴張勢力有關。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中國便苦於帝國主義在其領土內不斷增強的威脅，至該世紀末，中國已有如列強之殖民地。在此種情況下，清廷改變政策，試圖加強對蒙古的控制，實是意料中事。此政策的改變亦與清政府財政的困窘有關。清廷需要財源支付庚子賠款及確保新政——清廷力思救亡圖存的改革方案一一的推

<sup>25</sup>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164-165.

<sup>26</sup> 覺羅勒德洪等，《光緒實錄》，卷 514，頁 12a；卷 517，頁 2b；卷 518，頁 16a。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1523-195，光緒 29 年 4 月 23 日、光緒 29 年 5 月 2 日。

<sup>27</sup> 這些特殊情況包括重大災難發生，朝廷特准難民出關覓食，或某些王公以個案方式請求朝廷准予招墾漢民等等情況。

行。此外，內蒙地區非法墾殖的普遍現象，也使得清廷原先的禁制政策不再有實際意義。

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為了對抗列強的野心，清廷也會試圖改革，有所謂的同治中興與自強運動。儘管如此，甲午戰爭的失利證明了這些改革的失敗。而 1898 年的維新運動也以慈禧太后與其支持者所發動的宮廷政變而告終。在 1900 年遭逢八國聯軍的慘痛教訓後，清廷被迫再度踏上改革之路，期望這最後一擊可挽救其政權於垂危。1901 年 1 月 29 日，光緒皇帝宣佈開始實行新政。是年 4 月，慶親王奕劻為首的督辦政務處正式成立，以領導新政之推行。<sup>28</sup>

也就是在這種改革的氛圍中，清廷正式改變了對蒙古的政策。因為蒙古在政治及社會經濟結構上均與內地不同，新政在當地的重點也與內地有所區別。藉由新政，清廷一方面希望避免反清勢力的成長、爭取各省督撫及在華洋人的支持，一方面希望防止日俄勢力在蒙古的擴張，進而將蒙古地區變成與內地相同的行省。因此，對蒙殖民成為該地新政的重點。1902 年初，光緒皇帝允照山西巡撫岑春煊放墾蒙地之奏，指派兵部侍郎貽穀<sup>29</sup>為督辦盟旗墾務大臣，辦理察哈爾與烏蘭察布、伊克昭二盟放墾事宜。<sup>30</sup> 貽穀的任命揭示了清廷對蒙新政策的開始，而在內蒙的放墾也正式展開。

由於戶籍法令不完備，我們沒有清廷正式放墾期間移民內蒙的漢民確實數目，但這數目肯定相當龐大。根據柏原孝久等人的統計，二十世紀初居住在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與錫林格勒四盟的蒙民有 697,164 人，佔當地人口總數的 11.6%，移民有 5,297,844 人，佔當地人口總數的 88.4%。這些移民當中，除了移到錫林格勒盟大約 29,000 滿人外，其餘均是漢人。除了錫林格勒盟居住的漢人較少外，其他三盟充斥著漢人移民。<sup>31</sup> 如同前面所說，放墾是內蒙實行新政的第一步。放墾後，許多府州縣設立了，更多土地被併入行省轄區，蒙旗喪失了部分土地管理權。其他計畫如屯兵、開採天然資源、修建鐵路、整設驛站、辦理郵政電

<sup>28</sup> 覺羅勒德洪等，《光緒實錄》，卷 476，頁 8a-10b，卷 481，頁 4b。雖然奕劻名義上是該機構之領導，但實質上榮祿才是新政的真正主持者，他在 1903 年 4 月過世前一直扮演此角色。

<sup>29</sup> 貽穀乃滿洲鑲黃旗人，1892 年獲進士，1900 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時追隨慈禧避難西安，後授兵部左侍郎。其事業於 1908 年告終，1926 年身故。

<sup>30</sup> 覺羅勒德洪等，《光緒實錄》，卷 490，頁 14b-15a。

<sup>31</sup> 柏原孝久、濱田純一，《蒙古地誌》（上卷）（東京：富山房，1919），頁 739-757。

報、興學校、設警察、辦銀行等等都將在新政的名義下一一實行。<sup>32</sup>

一些防範蒙漢接觸的措施也廢止了。1910年9月，清廷宣布允准漢人入蒙耕種、典當蒙地、以及與已經招墾的蒙旗交易。允許漢人迎娶蒙婦，而蒙人也可以聘請漢人教席，以漢文書寫公文，取用漢名。<sup>33</sup> 保存蒙古傳統社會、政治與經濟體制，對已經轉變成漢式政權的清朝政府而言，已不再重要。

新政在外蒙的推行比內蒙晚了好幾年。新政策一在外蒙展開，馬上面臨蒙人的反對。1908年9月，土謝圖汗、車臣汗與沙比衙門共同致函庫倫辦事大臣延祉，要求將1888年派到庫倫的宣化軍撤出外蒙，因為此軍隊不但未能完成任務、鎮壓以陶克陶胡台吉為首的盜匪，而且成為蒙人的負擔；他們建議需要時可動員蒙古軍隊。但其要求未獲延祉同意；後者認為，當俄國獲准在庫倫和恰克圖駐軍時，要求中國軍隊撤出外蒙是不恰當的。<sup>34</sup> 外蒙一再公開反對新政，認為議會、選舉等做法對其社會而言並不實際，因為蒙人的生活方式是游牧、而非定居。<sup>35</sup> 他們也反對放墾。1911年3月，土車兩部允諾庫倫辦事大臣，假如清朝當局同意停止放墾外蒙土地的話，他們願意每年向當局各捐獻兩千兩。<sup>36</sup>

儘管清朝當局的確想在外蒙推行新政，但因財政困難、執行時間短暫、加上蒙人反抗，新政在內蒙地區的最主要部份－放墾、大規模漢人移民、設治－並未在外蒙進行。<sup>37</sup> 在外蒙的漢人多為商人、工匠、農民和官吏。<sup>38</sup> 除了一小部份的農民外，這些漢人多非永久居民。雖然新政在外蒙成效不大，但外蒙人透過觀察內蒙的發展，可以預見帶有殖民色彩的新政若在外蒙持續推行後將帶來的悲慘後果。在外蒙代表於1911年呈給沙俄政府的信函中，他們指責中國當局在內蒙進行的令人無法忍受的變革：殖民、設立州縣、削減札薩克權力、以及在俄國與呼

<sup>32</sup> 朱啓鈴，《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卷一）（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85），頁12a-16a。

<sup>33</sup> 覺羅勒德洪等，《大清宣統政紀實錄》（以下簡稱《宣統政紀》）（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1964），卷41，頁2a-3b。

<sup>34</sup>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63-66.

<sup>35</sup>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71.

<sup>36</sup>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95.

<sup>37</sup> 根據1919年出版的統計資料，只有大約150戶漢人在圖車兩部耕作1,500頃農地。參見蒙藏院總務廳統計科，《蒙藏院調查外蒙統計表》（北京，1919），頁5-7。

<sup>38</sup> 根據邁斯基（I. Maiskii）在1918年外蒙之行所蒐集的資料，當時約有100,000漢人在外蒙，分別是商人（75%）、工匠（15%）、農民（5%）、官吏與專業人員。根據同一人的統計估算，當時外蒙的人口（包括華俄人等）大約是647,504人。參見I. Maiskii, *Sovremennaia Mongoliia* (Irkutsk, 1921), s. 16, 70-72; Maiskii, *Mongolia nakanune revoliutsii*, s. 30, 84-86。

倫貝爾邊界以中國軍隊取代蒙古守軍。此信也提到 1891 年漢人在卓索圖盟與昭烏達盟起事反對蒙人之事。<sup>39</sup> 由於外蒙人對內蒙的情況相當了解，他們害怕清廷的殖民政策將會讓他們遭受與其內蒙兄弟相同的悲慘境遇。因此，他們決定尋求獨立，與大清帝國永久分離以避免其家鄉遭受滿漢政權的殖民迫害。

## 伍、三多等人施政不當

當清廷改變對蒙政策後，積極推展新政策的滿清官員在外蒙普遍受到敵視。在延祉任職庫倫辦事大臣期間，他以一種審慎的態度來進行改革。而繼任該職之三多<sup>40</sup>卻放棄原有的和緩做法，積極推動新政。三多 1909 年 11 月 26 日受任該職，於次年 3 月上旬抵達庫倫。<sup>41</sup> 他是一漢化蒙人，字六橋。在其任職綏遠副都統時，曾於 1909 年 8 月提議整頓蒙旗以禦強鄰，並表示應將全蒙分設四部，每部設大臣一員及綜理庶務之局十二，開辦五年後籌蒙經費改由蒙地自理。<sup>42</sup> 雖然三多的提議未獲清廷採用，但其認為有必要全面改革蒙古的想法由此可見。三多雖是蒙人，但其漢化與積極推行新政的做法，使他本身並不受外蒙人民歡迎。

三多抵達外蒙後不久，蒙漢民之間就爆發了衝突。根據三多的奏摺，當時有幾個喇嘛和漢商所經營德義湧木匠舖的職員因為價格問題產生爭執，喇嘛們被推出店舖時，其中有人撞到木墩子，氣憤的喇嘛們稍後帶著更多人回到木匠舖行搶。路過的士兵和巡警抓到其中三名鬧事者，但很快就被其他蒙民救走，過程中

<sup>39</sup> Barint bichgiin emkhtgel, 165-166; L. Dindub (Dendev), *Mongghol-un tobchi teüke*, 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 Issue 6 (Bloomington, 1977), pp. 9-10. Dindub 所著書原於 1934 年在烏蘭巴托出版，後由蒙古學會（Mongolia Society）以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 in the Autonomous Period* 的書名在美國出版。關於 1891 年漢人在卓昭二盟起事反對蒙人一事，指的是熱河的金丹道反抗活動。當時參加金丹道的漢人在「掃胡滅清」的口號下起兵反對當地的天主教會、蒙古王公與喇嘛寺院。關於此反抗活動，參見佐藤公彥，〈一八九一年、熱河の金丹道蜂起〉，《東洋史研究》，第 43 卷第 2 號，1984 年（9 月），頁 37-71；此文有張植華之漢譯，參見張植華譯，〈一八九一年的熱河金丹道起義〉，《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三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2），頁 24-58。

<sup>40</sup> 三多於 1875 年生於杭州，乃正白旗蒙人，受有優秀之文武訓練，並在十七歲中舉人試。任職庫倫辦事大臣之前，曾於浙江、北京、綏遠任文武各職。民國時期，仍任職共和政府，於 1940 年之後去世。

<sup>41</sup> 覺羅勒德洪等，《宣統政紀》，卷 23，頁 54a；三多，〈三多庫倫奏稿〉，收於吳豐培編，《清末蒙古史地資料薈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0），頁 259。

<sup>42</sup> 覺羅勒德洪等，《宣統政紀》，卷 16，頁 14b-15b。

幾個士兵遭到毆打。得知此一衝突後，三多帶人到木匠舖調查，得知甘丹寺的喇嘛車林多爾濟（Tseringáorji）是為首搶救三名蒙人並毆打士兵者。三多率領士兵抵達甘丹寺時，已有兩三千蒙民在該處聚集，並以石頭丟擊三多等人，但後者仍然逮捕到額林沁（Rinchin）和登曾（Denjen）兩蒙民。事後登曾承認自己為主犯，但堅不認罪。三多要求沙比衙門交出其他嫌犯，但遭拒絕，後者並且否認三多對此事件的說法。<sup>43</sup> 1910 年 5 月，土車兩部和沙比衙門上奏理藩院，抱怨三多的高壓統治並要求將其解職；他們指責三多將喇嘛編入軍警，並且聽信一面之詞、扭曲德義湧事件的真相。<sup>44</sup> 三多相當憤怒，在是年 11 月成功地讓庇護蒙民的厄爾德尼商卓特巴<sup>45</sup>巴特瑪多爾濟（Badamdorji）遭到革職。<sup>46</sup> 三多在抵達庫倫不久就因對德義湧事件的強硬處理態度遭到蒙人厭惡，他奏請革除巴特瑪多爾濟職務的做法也得罪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三多與蒙民間的惡劣關係為他在當地推展新政的工作蒙上了陰影。

抵達庫倫之後，三多積極推動新政，設立各種相關單位。此積極做法不僅是三多個人的選擇，也是北京的政策。中央各部門，尤其是內閣與軍諮府，一再督促三多開展各項計畫。此外，俄國對蒙古日漸增強的野心也迫使清廷對外蒙採取更積極的做法。<sup>47</sup> 當 1911 年蒙古代表團抵達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支助蒙古獨立時，在其呈給沙皇政府的書信中，就抱怨清朝當局讓漢人在外蒙北部數旗居住耕地。<sup>48</sup> 清朝當局這個做法明顯是要防衛外蒙北部免遭俄國滲透。

在外蒙設立的新單位中，唐在禮領導的兵備處是蒙人最痛恨的。因為唐氏深信，假如中國不立即在蒙古鞏固其勢力，俄國將在數年內控制此區域；<sup>49</sup> 所以他在做法上非常積極。唐氏自己承認，1911 年 1 月他剛開始工作時馬上面臨來自蒙人的反對。<sup>50</sup> 設立兵備處與訓練新軍進一步加重蒙人負擔。蒙人認為唐氏與其下屬傲慢而無紀律，因此蒙古領袖和俄國駐北京領事要求清廷廢除兵備處，並召回

<sup>43</sup> 三多，〈三多庫倫奏稿〉，頁 272-275, 323-342。

<sup>44</sup>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87-89.

<sup>45</sup> 商卓特巴（shangjudba）即寺院總管，而厄爾德尼商卓特巴（erdeni shangjidba）是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有財產屬民（即大沙比 yeke shabi）的最高主管。

<sup>46</sup> 三多，〈三多庫倫奏稿〉，頁 344-346。但巴特瑪多爾濟後來藉著捐款兩萬兩推展新政，在 1911 年 9 月重新拿回該商卓特巴之職，參見三多，〈三多庫倫奏稿〉，頁 412-416, 432-433。

<sup>47</sup> 陳鑑，〈止室筆記〉，頁 7, 179。

<sup>48</sup> Dindub, *Mongghol-un tobchi teüke*, 9;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165.

<sup>49</sup> 唐在禮著，吳豐培輯，〈庫倫邊情調查記〉，《中俄關係問題》，第 4 期，1982 年，頁 18。

<sup>50</sup> 唐在禮，唐在章，〈蒙古風雲錄〉（南昌，1912），頁 2a；陳鑑，〈止室筆記〉，頁 179。

練兵的軍官。唐在禮最後被迫離開外蒙，清廷並在是年 11 月下旬通過廢止兵備處。<sup>51</sup>

儘管三多等人只是推動清廷既定政策，但其積極的態度令蒙人心生恐懼，加上三多一到外蒙就因處理德義湧事件不當，致使蒙人對其無法信任，而唐在禮的做事方式及態度更令蒙人怨恨，不但加深蒙人對新政的反抗，也強化了蒙人的反滿情緒。

## 陸、清朝的崩解

儘管蒙古獨立運動的發起在 1911 年中國辛亥革命之前，但後者對此獨立運動的發展產生立即而重大的影響，提高了此一運動成功的可能性。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反滿清的抗爭在中國經常發生，許多蒙人知道這些反抗運動的存在，甚至參與了清廷鎮壓反對勢力的軍事行動。中國內地的革命不但為蒙人脫離滿清、重建獨立提供了機會，也提供了榜樣。

當中國內地反清革命即將成功、有些省份宣佈獨立時，蒙人以更大的決心執行其追求獨立的計畫。日本學者中見立夫寫道：「1911 年的中國革命提供那些長期鼓吹獨立的蒙古激進份子一個堅定的理論基礎，讓追求獨立一事得以讓所有蒙古人理解與支持，包括那些之前不願採取正面行動者。在此意義上，1911 年的革命可以看成是蒙古獨立運動發展的催化劑。」<sup>52</sup> 此一說法是相當正確的。中國革命的宣傳口號可能對蒙人也造成負面影響。同盟會「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誓詞中的「韃虜」指的是滿清，但有些外蒙學者認為此一詞同樣是反對蒙人的，<sup>53</sup> 因為「韃」字也在負面意義上用以指稱蒙人。

蒙人相信，一旦滿清政權垮台，原本分別為滿人所征服的蒙古和西藏理所當然可以各自獨立。有資料提到，當內蒙首領在 1636 年共同接受皇太極為其大汗時，滿蒙雙方約定：如果此一王朝崩潰，所有在此之前存在的法令將再度恢復其

<sup>51</sup> 陳鑑，《止室筆記》，頁 179-180, 182-183；覺羅勒德洪等，《宣統政紀》，卷 65，頁 10a。

<sup>52</sup> Nakami Tatsuo, "A Protest Against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Kingdom: The Mongol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Etō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man,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4), p. 136.

<sup>53</sup> L. Jamsran, *Mongolyn sergen mandalbyn ehen (1911-1913)* (Ulaanbaatar: Soembo Khevleliin Gazar, 1992), 117.

原有效力。<sup>54</sup> 根據巴拉諾夫（A. Baranov）在 1905 和 1917 年旅行蒙古時設法獲得的皇太極詔令的謄寫本，滿清皇帝當時曾承諾：「假若大清王朝垮台，你們可以根據原有的基本法則過日子。」<sup>55</sup>

我們無法確定此一詔令是真實存在或者只是蒙人後來偽造之物。然而，根據草原上的生存法則，一個能幹的領袖在成功時可將各部族聚集在其麾下，但當他失敗或死亡時這些部族則會棄之而去；一個游牧國家是在一個魅力領袖帶領下追求共同利益的部族聯盟，當原本結盟的因素不再存在時，這個國家常會瓦解。<sup>56</sup> 蒙人認為他們與滿人的關係就是一種結盟，而滿清帝國即是一個部族聯盟，蒙古、西藏和中國都是此聯盟中具有相等地位的成員。蒙人對滿人不把他們的地方當成一般中國內地行省、而用另一套法令制度加以統治的事實相當認同。<sup>57</sup> 他們相信，蒙古、西藏和中國是不同的；因此，一旦滿人皇位不保，這三個地區就可自動分離，不再屬於同一聯盟。

在外蒙的獨立宣言中，一開頭就寫道：「現在我們常聽到滿人和漢人在南方製造騷動，滿洲政權就要崩潰。因為我們蒙古本來就是獨立國家，我們經過討論後，決定基於我們古老的傳統，不讓他人妨礙我們的權利，建立一個新的獨立國家。」<sup>58</sup> 由此可見，儘管新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按照漢人傳統想法，認為它繼承了滿清帝國的疆域，外蒙仍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但蒙人卻有不同看法，清朝的崩潰對於外蒙選擇獨立是具有決定性的。

## 柒、俄國的角色

蒙古獨立運動是由蒙人主動發起的，並非如許多中國學者所言根源於俄國的

<sup>54</sup> Herbert A. Giles, *China and the Manch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2), p. 21.

<sup>55</sup> A. Baranov, *Aimak Tsetsen-Khana* (Harbin: Típo-litografiia Okhrannoï Strazhi Kit. Vost. zh. d., 1919), s. 30.

<sup>56</sup> 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1989), p. 5.

<sup>57</sup> 李毓澍也提及，清廷及其駐蒙官員極少過問各旗內政，使得蒙人認為他們有很高的自治權。李毓澍，〈論外蒙古獨立問題〉，收於氏著《蒙事論叢》（台北：著者自印，1990），頁 304。

<sup>58</sup> 本宣言影本，參見 Urgunge Onon and Derrick Pritchatt,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New York: E. J. Brill, 1989), pp. 127-130。本宣言亦可參見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110-111.

煽動。但是，這並不表示俄國對外蒙沒有野心。外蒙在戰略上對俄國十分重要，俄國自然對此地區充滿興趣與野心，1861年在庫倫設立領事館後就積極爭取蒙人的友誼。根據三多的報告，俄國領事和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及各蒙旗王公關係密切，常常贈送他們各種禮物。<sup>59</sup> 據說，在庫倫擔任俄國領事超過四十年的施什瑪勒福（Ya. Shishimarev）是當地實際上的領導者，因為蒙人不僅高度敬重他，而且在多數公共事務上都會徵詢他的意見。<sup>60</sup> 1910年10月施什瑪勒福離職返回俄國時，三多請求清廷獎賞施氏在外蒙長期傑出的服務；三多在奏摺中表示，施什瑪勒福相當公正，受到蒙漢人民一致的敬重。<sup>61</sup> 此外，廣為人知的是，在庫倫的俄商常常提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各種新奇的玩具、酒類和其他物品；他們也能很快和哲佛的密探結識，並以恭維方式拉攏這些人。<sup>62</sup>

俄國對外蒙的野心從其不斷施壓以獲取在該地區更大權利的事實上可以清楚看出。俄國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在滿洲與蒙古地區尋求鐵路方面的特權。俄國於1899年承認長江流域為英國勢力範圍，換取英國同意不參與對長城以北鐵路特權的競爭。同年，俄國獲得中國承諾北京往北或往東北至俄國邊界區域內鐵路的興建將獨由中俄雙方共同承擔。<sup>63</sup> 俄國於1905和1911年分別在烏里雅蘇台和科布多設立領事館。1908年當大型俄國公司開始對外蒙存在的商機感到興趣後，他們設立了幾個委員會、數度進行調查以研究外蒙市場並策畫促進俄國在當地貿易的方法。這些委員會或調查隊的人員相信，從嚴格的商業觀點來看，俄國政府有必要在政治上對外蒙有更進一步的作為。<sup>64</sup> 俄國駐外蒙的代表也不免受到這類看法的影響。因此，當外蒙代表赴俄尋求對其獨立一事加以協助時，沙俄內閣相關人員在1911年8月就此事召開的特別會議中承認，是俄國駐外蒙代表讓蒙人產生

<sup>59</sup> 外交部檔，03-32，130，134（1），宣統3年7月。

<sup>60</sup> Julius M. Price, F. R. G. S., *From the Arctic Ocean to the Yellow Se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2), p. 296.

<sup>61</sup> 三多，〈三多庫倫奏稿〉，頁316。

<sup>62</sup> Gustav John Ramstedt, *Seven Journeys Eastward, 1898-1912, among the Cheremis, Kalmyks, Mongols and in Turkestan and to Afghanistan*, translated from the Swedish and edited by John R. Krueger (Bloomington, Indiana: The Mongolia Society, 1978), pp. 55-56.

<sup>63</sup> MacMurra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Vol.2), pp. 204, 207-208.

<sup>64</sup> Gerard M.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49), pp. 52-53.

誤解，以為一旦他們尋求獨立、俄國將會加以協助。<sup>65</sup>

1911年蒙古代表團的到來對俄國外交部是件頗尷尬的事，但他們仍然受到接見。是年11月初，一些俄國武器彈藥送到外蒙，但除此之外，俄國並無其他動作。當外蒙驅逐滿清官員、在是年12月底宣佈獨立後，俄國才採取進一步的實質介入，在外交上向北京施加壓力，不准中國重返外蒙。<sup>66</sup> 此次外蒙革命得以不藉俄人支助而成功，乃因同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國內情勢混亂所致。

雖然俄國被外蒙要求支持其獨立，但它拒絕了。俄國外交部官員認為應該給予蒙人精神上的支持，但實際干預其內部事務並不恰當。不過，他們仍承認外蒙對俄國的重要性。外交部的態度很明顯地表現在他們1911年7月27日發給俄國駐北京公使廓索維慈（Ivan Korostovets）的電報中：「喀爾喀內部的情勢在各方面均未觸及我們核心的利益」，其重要性在於可資達成俄國在中國的政治任務的潛在用途。<sup>67</sup> 這些俄國官員害怕，一旦外蒙與中國脫離，俄國會被迫要以武力保護外蒙不受中國壓迫。<sup>68</sup> 他們也害怕，一旦支持外蒙獨立，俄國就必須挑起協助外蒙組織政府的艱鉅工作，這會迫使俄國投下大量經費與心力，將是一項非常吃力而不討好的事。<sup>69</sup>

儘管俄國並不支持外蒙獨立，但它的確幫助外蒙獲得自治，因為一個自治外蒙不但可以限制中國進一步的干涉，也可防止其他國家的干涉。因此，俄國熱切希望成為庫倫與北京雙方的調停者，並企圖乘機從中獲利。<sup>70</sup>

此外，俄國與日本曾在1912年7月簽訂密約，劃分雙方在蒙古之勢力範圍。根據此密約，外蒙為俄國勢力範圍，內蒙則為日本勢力範圍，俄國不可侵犯

<sup>65</sup> Komissia po Izdaniu Dokumentov Epokhi Imperializma,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ia v epokhu imperializma: dokumenty iz arkhivov tsarskogo 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1878-1917)*, ser. 2, t. 18, ch. 1, no. 329, s. 341；陳春華譯，《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頁5。

<sup>66</sup> Friters在他的書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的第二章對此過程有詳細確實的描述。

<sup>67</sup> A. Popov, vveg., "Tsarskaia Rossija i Mongoliia v 1913-1914 gg," *Krasnyi archiv* 37 (1929), s. 9.

<sup>68</sup> "Tsarskaia Rossija i Mongoliia v 1913-1914 gg," s. 13.

<sup>69</sup> 此意圖很清楚地表現在外交部長沙佐諾夫（S. D. Sazonov）1912年4月對國會（Duma）的演說中。參見 G. Grumm-Grzhimailo, *Zapadnaia Mongoliia i uriankhaiskii krai* (Leningrad, 1926), t. 2, s. 748-749。

<sup>70</sup> 蒙方也希望由俄國來調停。在哲佛1912年11月26日答覆袁世凱的電報中，要求北京不必派使節到庫倫，而透過雙方共同的鄰邦－俄國－來調停。參見 E. T. Williams,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4 (October 1916), p. 805。

日本在該區域的特殊權利。因此，俄國自然無法同意內外蒙統一。<sup>71</sup>

總之，俄國對外蒙保持極大興趣，也致力在當地獲取更大特權，但基於政治務實主義，它僅能支持外蒙自治，不同意外蒙獨立或內外蒙統一。俄國不支持外蒙獨立，因為它不想負起防衛外蒙獨立的責任，也不想因此破壞本身與中國的關係；不支持內外蒙統一則是顧及它與日本的秘密協議。從此一角度來看，儘管俄國駐蒙官員難逃煽動之責，但俄國政府並未鼓動外蒙獨立。將俄國煽動視為外蒙獨立主因的看法並不客觀。

## 捌、抗爭的前例

如前所述，清朝統治蒙古時期，由於漢商的滲透和滿清當局及蒙古王公加在一般牧民身上的各種稅役負擔，使得蒙人普遍貧困；他們不得不向上級請求免除部分稅役負擔。一般牧民與台吉向各部汗王求情，而四部與沙比衙門<sup>72</sup>則向清廷駐外蒙的將軍大臣、甚至理藩院求情，而有些牧民與低階喇嘛則訴諸更直接激烈的手段以表達其不滿情緒。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軍隊叛變、逃兵和上街暴動的事件增加。

1877年，一些喇嘛和牧民在庫倫一個宗教舞蹈儀式場合中攻擊幾位滿清軍官和士兵；由於有八名士兵嚴重受傷，商卓特巴被處以五頭牲畜的罰鍰。1882年1月，蒙人和漢商間爆發激烈衝突，甘丹寺的喇嘛砸毀一家漢人商店並攻擊店主，三百多名喇嘛和大群牧民涉及此一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巡警與官員同情並秘密保護參與事件的蒙古人。儘管庫倫辦事大臣命令沙比衙門和庫倫的堪布喇嘛（Khamba Lama，主教）逮捕鬧事者，但此一命令從未獲得執行。<sup>73</sup>

1888年，一大群烏里雅蘇台附近的士兵由於不滿新建營房的缺陷而產生暴動，暴動領袖鼓動其他士兵開小差回鄉。經過一番努力，滿清當局逮捕逃兵，其

<sup>71</sup> 關於此密約，參見 Ernest B. Price, *The Russo-Japanese Treaties of 1907-1916 Concerning Manchuria and Mongol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p. 117；密約俄文本，參見 E. D. Grimm, *Sbornik dogovorov i drugikh dokumentov po istorii mezhdunarodnykh otnoshenii na dal'nem vostoke (1842-1925)* (Moskva, 1927), s. 180。

<sup>72</sup> 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寺院及其財產屬民之單位。

<sup>73</sup> S. Purevjav, *Khuv'sgalyn ömnökh Ikh Khüree*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Khereg Erkhelekh Khoroo, 1961), 153-155.

首領隨後也遭處死。<sup>74</sup> 1900 年，蒙古士兵再度在烏里雅蘇台發起暴動。由於當時中國內地正是義和團排外運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清廷害怕俄國趁機入侵，故命令喀爾喀四部各徵兵一千名以防守邊界。<sup>75</sup> 兩千名由西二盟徵召來的士兵駐守在烏里雅蘇台附近，等候進一步指示。但因未領薪資、食物不足、遠離家鄉、住處又狹窄，士兵們普遍心情低落。因此，當滿清大臣指責他們中間有些人偷了漢商一盒錢時，這些士兵覺得十分憤怒，包圍了滿清大臣所住的內城，要求讓他們回家。當士兵接近時，滿清大臣和官員逃往山上躲藏，士兵砸毀漢人商舖和菜園，然後離城回鄉。滿清大臣將士兵遣散，而非加以逮捕。<sup>76</sup> 在外蒙的暴動事件，和在內蒙發生的類似事件一樣，都是由於受到委屈而產生的短暫事件，本質上具有破壞性，但並無進一步的政治目的。然而，隨著類似事件的增加，反滿情緒也明顯地加深。

1911 年蒙古革命運動的目的是獨立，而獨立是蒙人在此之前已試圖尋求的夢想。1900 年，哲布尊丹巴曾派遣巴特瑪多爾濟率團前往聖彼得堡，請求俄國協助建立一獨立蒙古國。由於當時俄國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中國東北，因此蒙古代表團並未達到目的。<sup>77</sup> 外蒙方面或許認為可以趁著義和團排外運動所造成的混亂狀況達到和滿清分離的結果。假如迪魯瓦呼圖克圖（Diluba Khutughtu）的記憶是可靠的，哲布尊丹巴曾於 1894 年派遣巴特瑪多爾濟前往聖彼得堡，請求俄國支持蒙古獨立。俄國認為外蒙的要求很正當，但必須等待更好的機會，因為當時滿清並無什麼嚴重狀況發生。是年中國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並在次年慘敗於日本之手。<sup>78</sup> 由此看來，在清朝勢力衰微受挫之際，外蒙曾不只一次企圖脫離清朝而獨立。列強在中國爭奪勢力的競賽中，外蒙落入俄國的勢力範圍，其他列強未得到俄國首肯前不願介入外蒙的事務。因此，外蒙若要獲取獨立的話，必須爭取俄國的支持。

<sup>74</sup> Sh. Natsagdorj, *Ar Mongold garsan ardyn khödölgöön*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Gazar, 1956), 44-45; Urgunge Onon, ed. and tran., *Mongolian Hero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pp. 8-9.

<sup>75</sup> 納察克多爾濟（Sh. Natsagdorj）相信，這些徵召來的士兵是要派到中國內地打義和團的。但根據《光緒實錄》的記載（卷 466，頁 5a、15b；卷 467，頁 14b-15a），這些士兵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保護蒙古邊界、防止俄國入侵。

<sup>76</sup> Natsagdorj, *Ar Mongold garsan ardyn khödölgöön*, 45-46; Barimt bichgiin emkhitgel, 13-16.

<sup>77</sup> Bügd nairamdarkh Mongol ard ulsyn tüük, 2: 404.

<sup>78</sup> Owen Lattimore and Fujiko Isono, *The Diluv Khutagt: 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2), pp. 67-68.

從這些抗爭的前例我們可以得知，1911 年的蒙古獨立運動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不滿情緒長期累積的結果。

## 玖、結論

十九世紀後半的外蒙由於漢商長期的滲透而債台高築，加上沉重的勞役負擔，經濟上面臨破產。而蒙古王公在滿清政權鞏固、利用價值減低的情況下，儘管表面上仍受清廷禮遇，但實際的政治地位大不如前。此外，部分清朝駐蒙官員操守能力不佳，無法得到蒙人信任。因此，蒙人對滿清政權的失望怨恨日益加深，陸陸續續爆發過許多抗爭行動。儘管清廷開始面臨外國強權及內部反抗勢力的挑戰，但因為仍能有效控制，這些抗爭只是短暫的行動，蒙人並未能團結起來，在政治上找尋其他出路。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滿清政權遭遇更大危機，甲午戰爭的挫敗、八國聯軍的恥辱迫使清廷割地賠款，而內部革命勢力也日益強大，清廷不得不展開更大規模的改革以求政權的延續。在這種情況下，外蒙看到機會，曾想藉助俄國尋求獨立，但時機尚未成熟，無法達成目標。而在新政的改革聲浪中，清廷放棄了原有的對蒙政策，由保護蒙人、禁絕蒙漢接觸，一變而為放墾蒙地、移民實邊。外蒙看見清廷在內蒙展開的各項措施及其造成的後果，心中原已疑懼萬分，對所謂「新政」充滿排斥，孰知新到任的三多、唐在禮等人卻是顧得了上意、顧不了民意，加緊腳步推動新政，更加深蒙人的危機感，決定尋求獨立。

俄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對外蒙政策轉趨積極，與外蒙關係日益密切。雖然當時主要的興趣在於經濟利益，但俄國駐蒙官員在俄商影響下卻讓蒙人產生過度期待，以為一旦追求獨立即可獲得俄方相助，因此蒙人決定脫離中國獨立時，第一個尋求援助的對象就是俄國。儘管俄國未必對外蒙沒有野心，但顧及當時的國際局勢、俄中關係以及在滿洲地區可能獲取的更大利益，俄國政府從未表態支持外蒙獨立。直至 1915 年夏天外蒙獨立運動宣告失敗，俄國官方支持的僅是外蒙自治，而非獨立，更別說是包括各地區蒙人的「大蒙古國」了。俄國政府在 1911 年蒙古獨立運動中致力扮演中介協調者的角色，企圖從中獲取本身最大利益，但並非引發外蒙獨立的主要動力。

清廷改變對蒙政策並開始在蒙地推行新政的做法讓蒙人決定尋求獨立，而清

朝的崩潰更讓蒙人認為獨立是唯一的選擇，因為他們兩百多年前結盟的對象已經不再存在，他們理所當然應該恢復原先的獨立狀態。假如清朝並未垮台，僅是持續推動蒙人厭惡的新政，蒙人或許仍會繼續他們的獨立運動，但他們的態度可能不會那麼堅決和理所當然。從蒙人觀點來看，清朝的崩潰賦予他們獨立的正當性，其影響力自是不言而喻的。

綜合上面的探討，我們可以將促成外蒙獨立的原因分成三類：遠因、近因與最終因（ultimate cause）。遠因包括經濟的破敗與滿清官員的無能，近因包括清末對蒙政策的改變以及三多、唐在禮等人的施政，而最終因則是清朝的崩敗。此外，個人的負面經驗也可能是部分蒙古王公發動獨立運動的原因之一。譬如，外蒙學者札斯藍（L. Jamsran）相信，杭達多爾濟會積極推動獨立運動和其子遭清廷處死有部分關係。<sup>79</sup> 也有人認為，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同意獨立是因受到女佛的鼓動。<sup>80</sup> 不過，與整體經濟的破敗、滿清對蒙政策的改變以及清朝潰亡等涉及大環境改變的主要因素相較之下，這些個人經驗和俄國的角色一樣，仍屬次要因素。

## 參考文獻

### 一、檔案資料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北京）：1523（機關號）-195（卷宗號），光緒 29 年 4 月 23 日、光緒 29 年閏 5 月 2 日。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1045（機關號）-308（案卷號），民國 4 年 10 月 6 日。

外交部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03-32（機關號），130（函），134（宗）(1)（冊），宣統 3 年 7 月；03-32（機關號），168（函），173（宗）(1)（冊），民國 2 年 11 月 5 日。

<sup>79</sup> 1906 年杭達多爾濟前往北京時，有一子相伴；稍後在他離城期間，該子因非法闖入皇宮之名而被捕，並在其得以返京營救前即遭處死。參見 Jamsran, *Mongolyn sergen mandalbyn echen*, 120。

<sup>80</sup> 據說，哲佛與女佛生有一子，哲佛失明後內政由女佛主持，女佛深恐其子無法繼承佛位，因此鼓動哲佛獨立，以保永久富貴。參見呂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1984，再版），頁 17。

## 二、中、日文部分

三多，1990，〈三多庫倫奏稿〉，收於吳豐培編，《清末蒙古史地資料薈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4，《旅蒙商大盛魁》（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2冊），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史書店。

矢野仁一，1925，《近代蒙古史研究》，東京：弘文堂。

朱啓鈴，1985，《東三省蒙務公牘彙編》，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佐藤公彥，1984（9），〈一八九一年、熱河の金丹道蜂起〉，《東洋史研究》，第43卷第2期，頁37-71。

吳豐培編，1988，〈連魁科布多奏稿〉，《科布多史料輯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呂秋文，1984再版，《中俄外蒙交涉始末》，台北：成文出版社。

李毓澍，1962，《庫倫辦事大臣建制考》，收於氏著《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波茲德涅耶夫，Ma. A.，1983-1989，《蒙古及蒙古人》，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後藤十三雄，1942，《蒙古の遊牧社會》，東京：生活社。

柏原孝久、濱田純一，1919，《蒙古地誌》，東京：富山房。

唐在禮、唐在章，1912，《蒙古風雲錄》，南昌。

唐在禮著，吳豐培輯，1982，《庫倫邊情調查記》，《中俄關係問題》，第4期。

崑岡等，1963（1886年初版），《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台北：啓文出版社影印。

———，1976（1899年初版），《欽定大清會典》，台北：新文豐出版社影印。

張植華譯，1992，〈一八九一年的熱河金丹道起義〉，《內蒙古近代史譯叢》（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第3輯，頁24-58。

陳春華譯，1991，《俄國外交文書選譯－關於蒙古問題》，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陳炳光，1987（1934年初版），《清代邊政通考》，台北：南天書局。

陳崇祖，1976（1922年初版），《外蒙古近世史》，台北：廣文書局。

陳篠，1971（1917年初版），《止室筆記》，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廖淑馨，1991（5），〈一年來外蒙古的政治改革〉，《中國大陸研究》，第34卷第5期，頁33-45。

劉坤一、張之洞，1977（1901年初版），《江楚會奏變法三摺》，台北：文海出版社。

蒙藏院總務廳統計科，1919，《蒙藏院調查外蒙統計表》，北京。

覺羅勒德洪等，1964，《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

\_\_\_\_\_，1964，《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

\_\_\_\_\_，1964，《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

\_\_\_\_\_，1964，《大清穆宗毅（同治）皇帝實錄》，台北：華聯出版社影印。

### 三、英文部分

Barfield, Thomas J., 1989,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Oxford and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Bawden, C. R., 1968, *The Modern History of Mongoli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89, 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Fritters, Gerard M., 1949,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Giles, Herbert A., 1912, *China and the Manch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Lan, Mei-hua, 1996,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A Pan-Mongolian Endeavor."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Lattimore, Owen and Fujiko Isono, 1982, *The Diluv Khutagt: 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 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MacMurray, John V. A., 1921,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with and Concerning China, 1894-191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akami, Tatsuo, 1984, "A Protest Against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Kingdom': The Mongol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Etō Shinkichi and Harold Z. Schiffrian,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Onon, Urgunge, ed. and tran., 1976, *Mongolian Hero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AMS Press.

Onon, Urgunge and Derrick Pritchatt, 1989, *Asia's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Mongolia Proclaims its Independence in 1911*. New York: E. J. Brill.

Price, Ernest B., 1933, *The Russo-Japanese Treaties of 1907-1916 Concerning Manchuria and Mongoli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Price, Julius M., F. R. G. S., 1892, *From the Arctic Ocean to the Yellow Se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Ramstedt, Gustav John, 1978, *Seven Journeys Eastward, 1898-1912, among the Chermis, Kalmyks, Mongols and in Turkestan and to Afghanistan*, translated from the Swedish and edited by John R. Krueger. Bloomington, Indiana: The Mongolia Society.

Sanjdorj, M., 1980, *Manchu Chinese Colonial Rule in Northern Mongolia*, in Urgunge Onon, tran., London: C. Hurst and Company.

Tang, Peter S. H., 1959, *Russia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E. T., 1916,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0, No. 4 (October): pp. 798-808.

#### 四、蒙、俄文部分

Baranov, A., 1919, *Aimak Tsetsen-Khana*. Harbin: Tipolitografija Okhrannoi Strazhi Kit. Vost. zh. d..

BNMAU-yn ShUA-iin Tüükhiin Khüreelen NAKhYa-ny Dergedekh Ulsyn Arkhivyn Khereg Erkhlekh Gazar, 1982, *Mongolyn ard tümnii 1911 ony ündesnii erkh chöлöö, tusgaar togtnolyn töлöö temtsel,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1900-1914)*.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Gazar.

Dindub (Dendev), L., 1977, *Monghol-un tobchi teüke (A Brief History of Mongolia in the Autonomous Period)*. 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 Issue 6. Bloomington.

Erdenetuyaa, N., 2000, *Mongolyn gurvan khuv'sgal*. Ulaanbaatar.

Grimm, E. D., 1927, *Sbornik dogоворов и drugikh dokumentov po istorii mezhunarodnykh otnoshenii na dal'nem vostoke (1842-1925)*. Moskva.

Grumm-Grzhimailo, G., 1926, *Zapadnaia Mongoliia i uriankhaiskii krai*. Leningrad.

Jamsran, L., 1992, *Mongolyn sergen mandalyn ehen (1911-1913)*. Ulaanbaatar: Soembo Khevleliin Gazar.

Jamsran, L., niitlüülsen, 1992, *Mongolyn tüükhiin deej bichig*. 4 devter. Ulaanbaatar: Surakh Bichig, Khüükdiin Nomyn Khevleliin Gazar.

Komissia po Izdaniu Dokumentov Epokhi Imperializma, 1933-1938,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a v epokhu imperializma: dokumenty iz arkhivov tsarskogo i vremennogo pravitel'stva (1878-1917)*. Moskva.

Maiskii, I. M., 1959, *Mongoliia nakanune revoliutsii* (Moskva: Izdatel'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 s. 172.

Maiskii, I., 1921, *Sovremennaia Mongoliia*. Irkutsk.

Ministerstvo Inostrannykh Del., 1914, *Sbornik diplomaticeskikh dokumentov po Mon-*

*gol'skomu voprosu (23 avgusta 1912 g. – 2 noiabria 1913 g.). Sankt-Peterburg.*

Mongol Ulsyn Ündesnii Arkhivyn Gazar, Shinjlekh Ukhaany Akademiin Tüükhiin Khüreelen, 1999, Khiatad, Oros, Mongol gurvan ulsyn 1915 ony Khiagtyn geree (*Ödör tutmyn temdegel*): Barimt bichgiin emkhtgel. Ulaanbaatar: Sogoo Nuur.

Natsagdorj, Sh., 1956, *Ar Mongold garsan ardyn khödölgöön*.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Gazar.

Okladnikov, A. P. & Sh. Bira, red., 1983, *Istoriia mongol'skoi narodnoi respubliki*. Moskva: Izdatel'stvo Nauka, Izd. 3-e.

Popov, A., vveg., 1929, "Tsarskaia Rossiia i Mongolia v 1913-1914 gg. Krasnyi arkhiv, no. 37, s. 3-68.

Pozdneev, A., 1896-1898, *Mongoliia i Mongoly: rezul'taty poezdki v Mongoliu, ispolnennoi v 1892-1893 gg.* Sankt-Peterburg: Tipografija Imperatorskoi Academii Nauk.

Purevjav, S., 1961, *Khuv'sgalyn ömnökh Ikh Khüree*.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Khereg Erkhelekh Khoroo.

Shirendev, B. & Sh. Natsagdorj, red., 1968, *Bügd nairamdakh Mongol ard ulsyn tükh*. Ulaanbaatar: Ulsyn Khevleliin Khereg Erkhelekh Khoroo.

# The Reasons for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Mei-hua Lan<sup>+</sup>

## ABSTRACT

At the end of 1911, the Mongols in Urga proclaimed their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Great Mongol State. Thanks to efforts of the Mongols of different regions, this new country had la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until its independent status was downgraded to autonomy by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of June 1915, signed by China, Russia, and Mongolia in Kyakhta.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us failed.

Why did the Mongols decide to seek independence and establish a state of their own after having been Manchu subjects for 220 years? The reasons for this independence movement are very complicated. The author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 remote causes, immediate causes, and ultimate causes. The remote causes comprise the economic collapse and the incapability of Manchu officials in Mongolia. The immediate causes comprise the change of Manchu policy in Mongolia in late Qing period and the maladministration of Sando and Tang Zai-li. The ultimate cause fo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the fall of the Manchu empir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role of Russia in this movement, and provides evidences of previous Mongolian resistances and independence attempts to prove that the Mongol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of 1911 was not a separate event, but the explosion of the accumulation of grievance. Of all the causes, the economic collapse, the change of Manchu policy toward Mongolia, and the fall of the Manchu empire are primary causes that concerned major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the role of Russia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

\* Mei-hua L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